

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 与会计信息质量

黄芳^{1,2},张莉芳³

(1.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南京大学 国际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3.南京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随着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趋于一致,私人关系等软治理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而成为公司治理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在最讲人情味、“有关系好办事”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分别研究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控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差;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关键词] 管理层权力;审计意见;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委员会;高管私人关系;公司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0)01-0025-09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内部财务治理机制是审计委员会,而审计委员会最核心与关键的成员便是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的审计委员会主任。作为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和负责人,审计委员会主任对审计委员会的运作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英国卡德伯瑞报告,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主要依赖强大独立的、对董事会和审计师充满信心的并具有非执行董事素质的主席,当然结构也很重要^[1],Schmidt等发现与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相比,召集人对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影响更显著^[2]。但是目前学术界却很少有针对审计委员会主任这一重要个体的研究。

在公司治理领域应用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的私人关系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最终影响公司绩效^[3-7]。那么,审计委员会主任的私人关系是否同样会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故本文首先将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进一步地,由于审计委员会是嵌入公司治理体系之中的,其治理效果依赖于公司治理环境。公司运营过程中,管理层尤其是CEO对公司经营拥有决策权和控制权。位高权重的管理层出于自利性动机,可能介入或干预审计委员会,从而降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力。Harris等研究发现,当CEO权力较大时,他们向审计委员会提供信息的数量会比较少并且质量也比较低,使得审计委员会的监控效力难于发挥^[8]。王守海和李云研究发现,管理层介入会减弱甚至完全抵消审计委员会对盈余管理的监管作用^[9]。潘珺和余玉苗也发现虽然审计委员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越大越能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但在财务负责人同

[收稿日期] 2019-09-05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8SJA0328);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TAPP)

[作者简介] 黄芳(1972—),女,江西都昌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舞弊审计、民间审计、公司治理,邮箱:85291579@sina.com;张莉芳(1972—),女,浙江金华人,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财务管理。

时任职于审计委员会的情况下,主任委员的这种正面效应将被明显削弱^[10]。故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国是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国家,私人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但迄今为止,国内却未有文献关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权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故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还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公司治理领域的学术文献,同时也为完善审计委员会制度提供了一些实证依据;对于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职资格和选聘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

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理论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对独立董事的相关研究也从独立性、专业性等结构因素转向独立董事的私人关系等软性因素。目前学术界对独立董事私人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是独立董事与高管间的私人关系会损坏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降低其监督意愿,形成所谓“橡皮印章”,从而降低董事会效率、丧失独立董事的设立意义。Hwang等研究发现,与董事之间存在私人关系的CEO其薪酬明显偏高、薪酬业绩敏感性偏低,且在公司业绩下滑时被迫离职的概率也较低^[12]。Khanna等研究发现,当董事会成员是由CEO任命时,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欺诈,也就是说,由任命形成的董事-CEO间私人关系会加大公司舞弊违规的可能^[13]。Bruynseels等发现,审计委员会与公司CEO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对其监督质量产生负面影响^[14]。二是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困难是独立董事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治理有效性直接受制于能够获得的公司营运信息数量多少以及质量高低。很多研究都发现独立董事的有效性依赖于信息环境。比如,唐清泉等发现,独立性并不是影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信息与知识影响更大^[15]。唐清泉等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78%的独立董事认为信息对他们发挥作用是最重要的,有84%的独立董事认为其最大的潜在风险是“因无法全面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而误判”^[16]。独立董事获取公司真实经营信息的困难使其空有独立立场和专业知识,却无用武之地。而独立董事与高管之间通过校友、老乡和同事关系等方式形成的私人关系会让彼此更愿意进行相关资讯或知识的分享,有助于独立董事了解管理层的行为,与管理层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从而解决造成监督障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好地发挥公司治理作用。Adams等的研究表明,CEO不会向过于独立的董事会分享信息,信息的缺乏极大削弱了董事会的建议和监督能力,尤其是限制了独立董事职能的发挥^[17]。Chahine等研究发现,IPO绩效与CEO-董事私人关系的强度呈正相关关系^[18]。Hoitash研究发现,独立董事-高管私人关系能增加彼此间的信任与信息共享,而且审计委员会董事-高管私人关系有助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改善^[19]。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独立董事私人关系的治理作用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我们认为,虽然独立董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其独立性监督管理层的投机行为以减少代理冲突,独立性被认为是独立董事的灵魂和核心,但是实践中不可因此有失偏颇地反对一切可能影响独立性的因素,过犹不及地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因为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绩效,在并未实质损害独立性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对信息环境等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审计委员会主任与公司高管之间因共同的出生地、教育或工作经历等形成的私人关系不属于具有重大财务、业务往来或亲属关系,不在英美加等国对“独立性”明文禁止之列;另一方面,这种非正式联结所形成的私人关系隐含着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认知,给彼此带来信任感,从而改善了审计委员会主任的信息环境,缓解了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了独立董事监督的效率。简而言之,“存在私人关系”与否并不构成审计委员会主任“独立”与否的标志,因为私人关系并不能促成或妨碍公司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主任合谋,但私人关系却能带来所获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进而影响信息不对称程度。陈霞等也发现,独立董事与

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7]。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相信,对审计委员会主任而言,与高管间存在私人关系有助于其获取信息从而更好地约束盈余管理。故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存在私人关系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二)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

1. 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

代理理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能导致所有者和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作为经济人的CEO可能因私利而忽视甚至损害股东利益。Francis等发现CEO倾向于通过操纵盈余来维持声誉提高自身收入^[20]。谢盛纹等发现,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与CEO权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21]。Bergstresser等通过研究高管持股与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薪酬体系中来自股票期权报酬比例越高,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显著^[22]。Feng等发现在高管集权的企业中,企业操纵盈余是CFO受到CEO的各种压力所致^[23]。Hart研究发现,拥有信息绝对优势的管理层为了追求私人利益,会利用其权力左右会计行为,加剧代理问题,降低会计信息质量^[24]。刘启亮等指出公司的权力配置结构会影响其会计行为^[2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

2. 管理层权力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影响

审计委员会主任的履职效果除了受自身特性的制约,还会受到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管理层干预审计委员会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

(1)总经理兼任董事长。两职兼任,集治理和经营管理两层级领导权于一身,拥有了不受牵制的绝对权力,内部控制形同虚设,总经理可以自己提名自己、自己聘用自己、自己监管自己,从而更容易左右会计选择,实施盈余操纵。董事会在绝对权力面前容易被俘获,董事会治理效率明显下降。Cohen等实证发现高管权力与审计委员会效率负相关^[26]。权小锋等的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其通过盈余管理操纵薪酬的程度也就越大^[27]。

(2)管理层直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管理层承担着财务报告的准备、出具和担保准确性等职责,可以很方便地指使公司财务报告部门操纵盈余。同时,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管理层又部分承担着财务报告监督权,在自利性动机的驱使下有机会通过影响审计委员会包括召集人,放任质量低劣的财务报告被披露给投资者。而那富含被操纵盈余的财务报告能够被准备、被发布,就充分说明了审计委员会的治理作用受到了不利影响。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管理层将大大削弱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使审计委员会受到管理层的控制而有名无实。同时,相较于审计委员会中的非执行董事,作为上市公司内部人的管理层掌握着各方面的重要信息,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从而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更多的话语权,能掌控并主导审计委员会的工作。刘桂良等研究了我国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随着董事长、CFO等关键人员兼任审计委员,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增大^[28]。张川等发现,总经理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会影响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29]。

(3)管理层占据提名委员会比重较大时,就构成了管理层实质上的董事提名权。此时,管理层能够选择自己的监督者——董事。当监督者是管理层所选择,那么在监督管理层时,就不太可能会忤逆管理层。已有研究发现,管理层介入审计委员会的任命会显著降低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30-31]。当然,管理层的董事提名权还可以通过强势个人比如总经理成为提名委员会成员来实现。

总经理的董事提名权意味着总经理选择了自己的监督者,总经理的董事提名权在法理上是一种异象,是不应该有的,也是不合逻辑的。而总经理一旦拥有提名委员会成员资格,他便事实上拥有了对董事提名的影响力,虽然做不到总经理一人说了算,但“行政首长”这一位置无疑赋予了他更多的话语权,导致审计委员会被总经理“俘获”而成为“傀儡”。也就是说,当总经理成为提名委员会成员时,作为公司“行政首长”,总经理的影响力足以影响整个提名委员会对董事的提名,被提名者就更可能是那些易于令总经理

意志得到实现的人选,他可能会疏忽其应当承担的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责,可能会容许管理层选择那些更易于提高盈余的会计政策,容许企业将低质量的财务报告发布给股东。

相对于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天然处于信息劣势,监督有效性依赖于管理层提供信息数量的多寡和信息质量的高低^[32]。所以,管理层还可以通过控制提供给审计委员会的信息来间接干预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由于担心审计委员会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反过来加大对他们的监管力度,管理层并不太愿意与审计委员会分享信息。在生产经营活动信息缺失、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使审计委员会是独立的,也无法有效地监督高管行为^[3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相信,在管理层主导的公司中,由CEO或独裁或能影响甚至掌握独立董事选聘大权时,与高管之间的私人关系可能使得审计委员会主任无法保持应有的监督意愿,继续做到趋利去弊,甚至可能存在与管理层之间合谋的可能性。故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公司管理层权力增加会对因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间的私人关系而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提高产生抑制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根据证监会2001年颁发的《指导意见》,2003年6月30日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要达到1/3,也就是说,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于2003年建成并步入正轨。故本文选择2004—2016共13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做以下调整:(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由非独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的公司。这样,一共得到23153个公司/年度样本。审计委员会主任个人信息来自百度、新浪财经等网络媒体;上市公司所属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数据使用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34];其他数据均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变量定义

1. 会计信息质量(ABACC)

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主要通过盈余质量表现出来。故我们以公司盈余管理水衡量会计信息质量,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的绝对值以ABACC来表示:

$$\frac{TA_{i,t}}{A_{i,t-1}} = \alpha_{0,i} + \alpha_{1,i} \left(\frac{1}{A_{i,t-1}} \right) + \frac{\beta_{1,i} (\Delta S_{i,t} - \Delta REC_{i,t})}{A_{i,t-1}} + \beta_{2,i,t} \frac{PPE_{i,t}}{A_{i,t-1}} + e_{i,t} \quad (1)$$

2. 私人关系(GX)

借鉴Chahine等的研究^[18],结合我国情况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独立董事与高管间的私人关系界定为独立董事与董事长、CEO或CFO存在校友、老乡或同事关系。本文构建的私人关系是虚拟变量,测量审计委员会主任与董事长、CEO或CFO等高管是否存在私人关系。

3. 管理层权力(POWER)

POWER指的是管理层权力变量,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POWER赋值为1,否则为0:一是两职兼任,即总经理兼任董事长;二是CEO直接介入审计委员会,即总经理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三是CEO具有董事提名权,即CEO兼任提名委员会成员。

4. 控制变量

Control包含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管理层特征方面,我们控制了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占比(INDRate)、高管薪酬(MAGPAY);公司特征方面,我们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Comold)、股权集中度(Toptenrate)、市账率(BM)、股权性质(SOE)、两权分离率(Seperation);财务特征方面,我们控制了成长性(Growth)、财务杠杆(LEV)、公司盈利能力(ROA)、亏损与否(Loss);审计特征方面,我们控制了审计

意见(OP)和是否大所审计(Big);其他方面,我们控制了市场化进程(Marketindex)、年份(Year)和行业(Ind)等因素,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审计委员会主任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即假设1,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ABACC_{i,t} = a_0 + a_1 GX_{i,t} + \sum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了检验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即假设2)以及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即假设3),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ABACC_{i,t} = \beta_0 + \beta_1 GX_{i,t} + \beta_2 POWER_{i,t} + \beta_3 POWER_{i,t} \times GX_{i,t} + \sum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POWER指的是管理层权力,GX指的是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间的私人关系,两者均为虚拟变量。交乘变量以自变量GX和POWER进行交乘得到。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ABACC的均值明显大于中位数,说明有些公司的盈余操纵较为严重;平均有18.6%的审计委员会主任与公司高管存在校友、老乡和共同工作经历;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者审计委员会成员或者提名委员会成员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2.9%。

控制变量中,独董占比、市账率、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成长性、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规模、两权分离率、上市年限和市场化进程等为连续变量,而是否亏损、是否国有、是否非标审计意见等为虚拟变量。经过自然对数和Winsorize处理后,样本中公司规模的区别不大,差距不到一倍。公司的市账率差别比较大,最低的为0.218,最高的达12.11,平均市账率接近2.25倍。前十大股东持股比率最小为21.46%,最高为90.14%,均值和中位数均在56%左右。LEV即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47%左右,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3.2%左右,公司年龄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14左右,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5.9%,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INDRATE介于18.2%—57.1%之间,均值36.8%和中位数33.3%均大于证监会1/3最低比例要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ABACC	可操控应计额的绝对值,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	
自变量	POWER	管理层权力,当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或审计委员会成员或提名委员会成员时取1,否则为0	
	GX	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存在私人关系时取1,否则为0	
	INDRATE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	
	MAGPAY	高管薪酬,前三位高管薪酬总额×10/总资产	
	STATE	产权性质,公司控制人为国有时取1,否则为0	
	LOSS	是否亏损,当年净利润小于0取1,否则为0	
	BM	市账率,年末市值/年末账面价值	
	LEV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GROWTH	销售收入增长率	
	SIZE	公司规模,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Seperation	两权分离率,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
		ROA	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年末资产总额的平均值
		BIG	外聘审计师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八大所时取1,否则为0
MAO		非标准审计意见取1,否则为0	
Toptenrate		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COMOLD		公司年龄,样本年份减去公司成立年份	
Marketindex		市场化进程,取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34]	
IND	行业控制变量,共15个		
YEAR	年度控制变量,共13个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N	Min	Mean	P50	Max	SD
Panel A: 因变量						
ABACC	23150	0.000	0.067	0.045	0.357	0.070
Panel B: 自变量						
POWER	23153	0	0.329	0	1	0.470
GX	23153	0	0.186	0	1	0.389
Panel C: 控制变量						
BM	23015	0.218	2.246	1.583	12.110	2.150
ROA	23152	-0.334	0.032	0.032	0.199	0.066
LEV	23152	0.054	0.478	0.474	1.475	0.235
GROWTH	23113	-2.308	0.059	0.101	0.834	0.375
STATE	23153	0	0.477	0	1	0.500
LOSS	23153	0	0.113	0	1	0.317
Toptenrate	23082	21.46	55.870	56.57	90.14	15.365
Seperation	21954	0	5.454	0	29.301	7.879
MAGPAY	23086	0.000	0.006	0.004	0.043	0.007
SIZE	23152	18.889	21.872	21.75	25.674	1.267
MAO	23153	0	0.053	0	1	0.224
COMOLD	23153	1	14.575	14	36	5.356
INDRATE	23065	0.182	0.368	0.333	0.571	0.053
Marketindex	23153	-0.3	7.371	7.51	11.04	1.807

求。从 STATE、LOSS 和 MAO 等哑变量的均值来看,11.3% 的公司业绩亏损,47.7% 的公司为国有,5.3% 的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

(二) 相关系数检验

由表 3 可知,私人关系 GX 与会计信息质量 ABACC 在 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之间的私人关系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POWER 与 ABACC 在 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层权力越大,应计盈余操纵越严重,即会计信息质量越差,这为本文的假设 1 和假设 2 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 3 变量相关性分析

	ABACC	power	GX	BM	ROA	LEV	GROWTH	STATE	LOSS	Toptenrate	Seperation	MAYPAY	BIG	MAO	SIZE	COMOLD	Marindex	INDRATE
ABACC	1																	
power	0.015**	1																
GX	-0.023***	-0.017***	1															
BM	0.092***	0.094***	-0.021***	1														
ROA	-0.105***	0.011*	0.037***	0.135***	1													
LEV	0.181***	-0.072***	-0.016**	-0.300***	-0.400***	1												
GROWTH	-0.009	0.020***	0.022***	-0.047***	0.300***	-0.057***	1											
STATE	-0.033***	-0.207***	-0.011*	-0.264***	-0.086***	0.219***	-0.030***	1										
LOSS	0.116***	-0.015**	-0.038***	0.030***	-0.665***	0.251***	-0.270***	0.042***	1									
Toptenrate	0	0.001	0.027***	-0.005	0.223***	-0.136***	0.143***	0.002	-0.151***	1								
Seperation	0.005	-0.033***	-0.017**	-0.054***	0.020***	0.059***	-0.009	-0.150***	-0.008	0.078***	1							
MAYPAY	0.056***	0.082***	-0.027***	0.558***	0.024***	-0.194***	-0.100***	-0.244***	0.048***	-0.088***	-0.025***	1						
BIG	-0.038***	0.038***	0.032***	0.018***	0.057***	-0.034***	0.027***	-0.01	-0.026***	0.094***	-0.003	0.003	1					
MAO	0.148***	0.003	-0.037***	0.152***	-0.323***	0.311***	-0.195***	-0.019***	0.302***	-0.140***	-0.004	0.177***	-0.052***	1				
SIZE	-0.062***	-0.061***	0.029***	-0.482***	0.097***	0.245***	0.129***	0.261***	-0.130***	0.211***	0.031***	-0.605***	0.182***	-0.211***	1			
COMOLD	0.066***	-0.008	-0.046***	0.032***	-0.077***	0.170***	-0.099***	0.080***	0.058***	-0.261***	0.013*	0.019***	0.011*	0.071***	0.160***	1		
Marindex	-0.028***	0.084***	0.013**	0.087***	0.111***	-0.172***	0.033***	-0.208***	-0.094***	0.098***	-0.051***	0.098***	0.141***	-0.090***	0.092***	0.080***	1	
INDRATE	0.028***	0.106***	-0.001	0.078***	-0.018***	-0.020***	-0.018***	-0.077***	0.013*	0.017**	-0.066***	0.026***	0.032***	-0.006	0.040***	0.021***	0.039***	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三) 回归结果分析

1. 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分析

从表 4 的三个回归结果来看,因变量调整后的 R² 为 0.15 左右,F 统计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方程整体拟合度较好。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 GX 与可操控应计额的绝对值 ABACC 在 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T 值≈-3.51),这表明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故本文的第一个假设通过了检验。然后,本文按企业产权性质区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GX 与 ABACC 分别在 5% 和 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无论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为国有还是非国有,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都显著地有助于抑制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从控制变量来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在 1% 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收入增长较快、市账率较高、发生亏损、股权集中度较高、财务状况较差(资产负债率较高)或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而聘请大所审计、规模 SIZE 较大或公司业绩较好(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低。这些结论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2. 管理层权力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

表 5 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为检验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

表 4 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私人关系	GX	-0.0043*** (-3.5089)	-0.0037** (-2.1448)	-0.0050*** (-2.8862)
市账率	BM	0.0055*** 16.4865	0.0060*** -10.0011	0.0053*** 12.7107
资产收益率	ROA	-0.0330*** (-2.9003)	-0.0428** (-2.5212)	-0.0277* (-1.7765)
资产负债率	LEV	0.0475*** 17.2321	0.0445*** -10.6933	0.0516*** 13.6233
成长性	GROWTH	0.0125*** 8.8748	0.0112*** -5.3059	0.0133*** 6.9588
公司性质	STATE	-0.0051*** (-4.4957)		
亏损	LOSS	0.0159*** 7.6933	0.0116*** -4.21	0.0206*** 6.598
股权集中度	Toptenrate	0.0003*** 9.1777	0.0003*** -6.1066	0.0003*** 6.6163
两权分离率	Seperation	-0.0001 (-1.2044)	0 -0.5424	-0.0002** (-2.3762)
高管薪酬	MAGPAY	-0.4490*** (-4.6493)	-0.2676 (-1.4729)	-0.4774*** (-4.0173)
事务所规模	BIG	-0.0024** (-2.3337)	-0.0027* (-1.8051)	-0.0025* (-1.7200)
审计意见	MAO	0.0172*** 6.7515	0.0253*** -7.1246	0.0087** 2.3719
公司规模	SIZE	-0.0026*** (-4.2266)	-0.0025*** (-2.9460)	-0.0020* (-1.9455)
公司年龄	COMOLD	0.0005*** 4.5409	0.0003* -1.659	0.0006*** 4.0373
市场化进程	Markindex	0.0003 1.075	0.0007 -1.6238	0 -0.065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用 *POWER* 作为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结果(1)。然后将 *GX* 和交乘项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2)。在结果(1)和结果(2)中,*POWER*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如果公司不具备对管理层权力的有效控制手段,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假设2通过了验证。在结果(2)中,*GX*与*ABACC*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与模型(1)相同,进一步支持了模型(1)的分析结论。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 *POWER×GX* 来看,其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管理层权力对私人关系 *GX* 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抑制效应,在管理层强权的公司治理环境中,与管理层具有私人关系并不能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相对独立的影响,相反,在管理层强权的情况下,审计委员会主任与管理层间的私人关系反而可能为两者之间的合谋提供了机会,从而产生了抑制效应,假设3得到了支持。各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表5中模型(1)的结果类似,不再赘述。

表5 管理层权力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影响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1)		(2)	
		<i>ABACC</i>	<i>T</i> 值	<i>ABACC</i>	<i>T</i> 值
管理层权力	<i>POWER</i>	0.0032***	3.05	0.0031***	2.9996
管理层权力与私人关系交乘项	<i>POWER×GX</i>			0.0052**	2.0028
私人关系	<i>GX</i>			-0.0042***	(-3.4096)
市帐率	<i>BM</i>	0.0055***	16.49	0.0055***	16.5071
资产收益率	<i>ROA</i>	-0.0327***	-2.87	-0.0322***	(-2.8237)
资产负债率	<i>LEV</i>	0.0476***	17.24	0.0475***	17.2353
成长性	<i>GROWTH</i>	0.0124***	8.81	0.0124***	8.8182
公司性质	<i>STATE</i>	-0.0044***	-3.9	-0.0045***	(-3.9770)
亏损	<i>LOSS</i>	0.0161***	7.8	0.0160***	7.7455
股权集中度	<i>Toptenrate</i>	0.0003***	9.17	0.0003***	9.1461
两权分离率	<i>Seperation</i>	-0.0001	-0.99	-0.0001	(-1.0284)
高管薪酬	<i>MAGPAY</i>	-0.4475***	-4.63	-0.4531***	(-4.6923)
事务所规模	<i>BIG</i>	-0.0026**	-2.49	-0.0025**	(-2.4049)
审计意见	<i>MAO</i>	0.0173***	6.81	0.0173***	6.7772
公司规模	<i>SIZE</i>	-0.0026***	-4.22	-0.0026***	(-4.1830)
公司年龄	<i>COMOLD</i>	0.0005***	4.72	0.0005***	4.5877
市场化进程	<i>Markindex</i>	0.0003	1.04	0.0003	1.0703
独立董事占比	<i>INDRATE</i>	0.0157*	1.7	0.0156*	1.6853
截距项	<i>_cons</i>	0.0693***	4.85	0.0698***	4.8827
观测数	<i>N</i>		21686		21686
调整后 R ²	<i>adj. R²</i>		0.1484		0.149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多重共线性检验。考虑到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对表5中各个回归模型检验了其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各模型 VIF 值一律大于1小于2.33,容忍度介于[0.43, 0.99],且均大于0.1。说明各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2)改变主要变量定义。借鉴 Kathari 等的做法^[35],在修正的 Jones 模型中加入 *ROA* 计算业绩调整的可操控应计额,重新回归,研究结论保持一致。(3)分组回归。按是否亏损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组,回归结果没有变化。由于检验结果与前文不存在实质性差异,故未在文中列出,资料备案。

五、结论性评述

衡量审计委员会治理绩效的核心指标是会计信息质量。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于一致,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审计委员会主任作为审计委员会的关键核心成员,其私人关系是否影响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同时,由于审计委员会是嵌入公司治理体系之中的,其治理效果还受制于公司治理环境,如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控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差;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能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权力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说明,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并不构成审计委员会主任“独立”与否的标志,也不必被回避或禁止,相反地,审计委员会主任反而可藉由私人关系获取监督所必需的信息,解决独立董事制度中最大的障碍——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当管理层权力能够“俘获”审计委员会时,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确实可能为两者之间的合谋提供了机会。

本文尝试性研究了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管理层强权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后续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拓展:(1)不但考虑审计委员会主任与高管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否存在,而且考虑私人关系的广度和强度,可能会有更细节性的结论;(2)如果今后信息收集可行,在界定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时,高管范围由董事长、CEO或CFO拓宽至高管团队;(3)除了高管权力等内部治理环境之外,还有投资者保护等外部治理环境,故可以考虑其他宏观和微观治理环境因素对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4)考虑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与高管间的私人关系对于审计委员会治理效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Cadbury S A. The financial asp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UK [R]. 1992.
- [2] Schmidt J, Wilkins M S. Bringing darkness to light: The influence of auditor quality and audit committee expertise on the timelines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restatement disclosure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3, 32(1):221 - 244..
- [3] 陆瑶,胡江燕.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对中国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4(3):131 - 138.
- [4] 韩洁,田高良,李留闯.连锁董事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J].管理科学,2015(1):18 - 31.
- [5] Hoitash U. Should independent board members with social ties to management disqualify themselves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9(3):399 - 423.
- [6] Chahine S,Goergen M.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board ties on IPO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3,21(1):153 - 179.
- [7] 陈霞,马连福,贾西猛.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8(3):131 - 146.
- [8] Harris M, Raviv A. A theory of board control and size[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20(4):1797 - 1832.
- [9] 王守海,李云.管理层干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J].审计研究,2012(4):68 - 75.
- [10] 潘珺,余玉苗.审计委员会履职能力、召集人影响力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J].南开管理评论,2017(1):108 - 118.
- [11] 王晓玉,晁钢令.中国市场上私人关系对企业间关系的影响——基于企业间核心关系变量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07(1):37 - 45.
- [12] Hwang B H, Kim S. It pays to have friend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3(1):138 - 158.
- [13] Khanna V, Kim E H, Lu Y. CEO connectedness and corporate fraud[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3):1203 - 1252.
- [14] Bruynseels L, Eddy C. The audit committee: Management watchdog or personal friend of the CEO?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4, 89(1):113 - 145.
- [15] 唐清泉,张迪.独立性与报酬、知识与信息,谁更重要——基于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问卷调查[J].当代经济管理,2005(6):32 - 35.
- [16] 唐清泉,罗党论.设立独立董事的效果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问卷调查[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20 - 127.
- [17] Adams R B, Ferreira D. A theory of friendly board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62(1):217 - 250.
- [18] Chahine S,Goergen M.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board ties on IPO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3, 21(3):153 - 179.
- [19] Hoitash U. Should independent board members with social ties to management disqualify themselves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9(3):399 - 423.
- [20] Francis J, Huang A, Rajgopal S, et al. CEO reputa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1):109 - 147.
- [21] 谢盛纹,叶王春子. CEO权力、环境不确定性与盈余管理[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3):21 - 36.
- [22] Bergstresser D, Philippon T.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0(3):511 - 529.
- [23] Feng M, Ge W, Luo S, et al. Why do CFOs become involved in material accounting manipulat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1, 51(1):21 - 36.
- [24] Hart O.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M]. Mexic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5] 刘启亮,罗乐,张雅曼,等.高管集权、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J].南开管理评论,2013(1):15 - 23.
- [26] Cohen J, Krishnamoorthy G, Wright A.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post-sarbanes-oxley era: Auditors experience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 27(3): 751 - 786.

- [27] 权小锋, 吴世农.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4): 142 - 153.
- [28] 刘桂良, 康瑞睿. 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J]. 系统工程, 2011(8): 86 - 90.
- [29] 张川, 黄夏燕. 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管理层激励与盈余质量[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8(3): 40 - 51.
- [30] 刘焱, 姚海鑫. 高管权力、审计委员会专业性与内部控制缺陷[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2): 4 - 12.
- [31] Harris M Artor R. A theory of board control and size[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21(4): 1797 - 1831.
- [32] Beasley M S, Carcello J V, Hermanson D R, et al. The audit committee oversight proces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26(1): 65 - 122
- [33] Adams R B, Ferreira D. A theory of friendly board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62(1): 217 - 250.
- [34] 王小鲁, 樊纲,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35] Kathari S P, Leone A J, Wasley C E.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1): 163 - 197.

[责任编辑:高 婷]

Managerial Pow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rector of Audit Committee & Senior Executive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HUANG Fang^{1,2}, ZHANG Lifang³

(1. Government Audit Scho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3,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3. Accounting School, Nanj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end to be consistent, soft governance factors such as private relations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and become the frontier and hot issu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where human relation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study of private relations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ak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6 as s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rector of audit committee and senior execu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power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managerial pow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director-executi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company lacks effective means to control the power of management, the greater the power of management is, the worse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or of audit committee and the executive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but the power of man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restraining effect between director of board of auditors-Senior Executi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managerial power; audit opini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udit committee; private relations among senior executives; governance structure